

范方俊·著

洪深

与

二十世纪

中外现代戏剧

HONGSHEN
YUERSHISHIJI
ZHONGWAI
XIANDAI XITU

文化艺术出版社

洪深与二十世纪中外现代戏剧

范方俊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洪深与二十世纪中外现代戏剧/范方俊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9

ISBN 7-5039-2400-4

I. 洪… II. 范… III. ①洪深-人物研究 ②戏剧-研究-世界-现代 IV. ①K825.78 ②J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1308 号

洪深与二十世纪中外现代戏剧

著 者 范方俊

责任编辑 周 岩

封面设计 怀 一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125

字 数 375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7-5039-2400-4/J·669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绪论 从中西现代文学比较到中西现代戏剧比较 ——关于引入洪深与中外现代戏剧个案研究的说明

一 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比较文学是在十九世纪以来,各民族文学日益汇入世界文学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早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精辟地论述了各民族文学突破其民族的界限,坚定地走向世界文学的历史必然性: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正是由于十九世纪以来各民族的文学在相互影响和渗透的过程中成为整个世界文学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以往单纯地从单个民族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各民族文学史的做法,既无法清晰、全面地透视出各民族文学在走向世界文学的历史潮流中发生、发展的全部过程,也无助于超越各民族文学之上的共同规律的揭示。而作为“专指超越国别文学界限的文学研究的特定术语”^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

② 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见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的比较文学,由于它的开放性的理论视界,以及“把某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宏观发展中来加以考察”^①的根本原则,使得它“无论是通过不同语言现象和表达方式探索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还是研究某一文学形象在国际范围内的渊源流变都取得了很大进展”^②。无怪乎美国当代文学理论家勃洛克(Haskell Block)在展望比较文学在二十世纪文学研究的广阔前景时不无自信地表示:“当前没有任何一个文学研究领域能比较文学更引起人们的兴趣或有更加远大的前途;任何领域都不会比较文学提出更严的要求或更加令人眷恋。”^③比较文学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发端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文学,一方面是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中外文明碰撞下的产物。在中国漫长的文学发展史上,虽然也曾出现过魏晋时期印度佛教的传入对于中土文化的渗透和改造,但不可否认,外来文化真正对中国固有文化构成强烈震撼和冲击,并由此引发中国文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艰难蜕变的,却是二十世纪头几十年里发生的事实。在这短短的数十年中,不仅西方的自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年间以历时代发生的各种文艺思潮、以共时态的形式一起涌入中国,而且东方的日本、印度等国的文明也在中华大地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如此众多的外来文化思潮的涌入,与中国的固有文明和当下现实相互交融与碰撞,其涉及范围之广,相互碰撞之激烈,以及延续时间之持久,不但为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史所绝无仅有,即便是放

① 乐黛云:《中国文学史教学与比较文学原则》,见《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② 乐黛云:《中国比较文学的现状与前景》,见《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③ 勃洛克:《比较文学的新动向》,见干永昌编《比较文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06页。

眼整个世界文化史,这种情况也是不多见的。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在中国数千年文学发展史中只占有几十年的时间,但这几十年恰恰是中国文学置身于中外文明的撞击中,通过对众多外国文化筛选、吸收、容纳、改造,最终创造性地再造出中国崭新的现代文学传统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应该说,异域文化的渗入与影响是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显著性标志。这一点已经为中国现代文学近半个世纪的发生发展历史所印证。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是在革新旧的古典形态的文学的基础上创生出的一种新的现代形态的文学。其先声是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首倡的“文体革新”。1902年,梁启超承十九世纪末“诗界革命”之余绪,以“俗语”入文,并辅以外语语法,开创出一种有别于旧的文言文的“新文体”,“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① 尽管这种“新文体”相较于后来的现代文学而言,还仅仅属于过渡性质,但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为后面继起的现代文学指引了方向:其一是白话俗语的介入;其二是对异域因子的吸收。1905年,王国维发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述了异国思想给予中国思想的深刻影响:

自周之衰,……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

自汉以后,……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但守其师说,无创作之思想,学界稍稍停滞矣。

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②

① 严复:《与熊纯如书札》,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见《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有鉴于此,王国维大声疾呼当日之学术界,“当破中外之见”,“无论其出于本国或出于外国,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苦痛者,则一也”,如此,“吾国今日之学术界,……则庶几可有发达之日欤?”^① 1907年,青年鲁迅发表《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力倡“别求新声于异邦”: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文化偏至论》^②

欲物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

——《摩罗诗力说》^③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的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要求青年一代放弃中国旧有的观念,转而向西洋学习进步的观念。为此,他特地为中国的青年读者介绍了一大批西洋哲人,如德国的尼采(Nietzsche)、倭铿(R. Eucken),法国的孔特(Comte)、柏格森(H. Bergson),英国的约翰·穆勒(J.S. Mill),俄国的托尔斯泰(Tolstoy)等。^④ 胡适也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呼吁新文学的创造者们做中国的费舒特(Fichte)、玛志

①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见《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②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③ 同上,第65页。

④ 参阅陈独秀:《敬告青年》,见《新青年:民主与科学的呼唤》,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3页。

尼(Mazzini)。① 更重要的是,向异域文学汲取营养,在中外文学的交汇中创造新文学,已不仅仅是一两位先驱者在那里摇旗呐喊、孤军奋战,而是成为这一时期中国进步文学界的一种共识。随便翻阅一下当时的报刊杂志,我们就可以找到如下类似的言论:

一国的文学,如果不和外国文学相接触,一点不受外来的影响,年代久了,一定会入于衰老的状态,而陈陈相应地变不出花样来,终于得到腐朽的结果的。

——刘大白:《从毛诗说到楚辞》

想在中国创造新文学,从那些纷乱如丝的,古典式的,陈陈相应的,大部分为非人的文学书中,是决不能成功的。所以不能不取材于世界各国。取愈多而所得愈深。新文学始可以有发达的希望。

——郑振铎:《文学丛谈》

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并在其间涌现出三位划时代的代表人物。首先是鲁迅。鲁迅的文学事业,是从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开始的。从早期写作《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出版《域外小说集》,直至逝世前翻译果戈里的《死魂灵》,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鲁迅从未中断过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工作。在他翻译和介绍的外国文学中,有拜伦、雪莱、密茨凯维奇、裴多菲、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有果戈里、契诃夫、显克维支、夏目漱石、森鸥外、阿尔志跋绥夫、契里珂夫、伐佐夫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有尼采、安得烈耶夫为代表的象征主义文学,最后还有以法捷耶夫为代表的苏俄文学。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不仅开拓了鲁迅的文学视野,而且为他

①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见《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37页。

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榜样。早在 1909 年,鲁迅就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说:“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循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①,这里的“相度神思之所在”,指的就是要把外来的影响作为自己创作的借鉴。后来在回答自己怎么做起小说时,鲁迅又坦言,自己“所依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②。这里尽管有自谦的成分存在,但不可否认,鲁迅先生之所以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是与他对外国文学的借鉴、吸收和改造密不可分的。其次是郭沫若。早在少年时代,郭沫若就通过阅读林纾翻译的小说与外国文学开始了精神交往。他对英国小说家司各特(Scott)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英国诗人吟边燕语》爱不释手,这些书使他“感受着无上的兴趣”^③。后来走出国门后,“便不期然而然地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我接近了泰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勒,更间接地和北欧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都得到接近的机会。这些便在我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因而不知不觉地便发出了枝干来”^④。最后是茅盾。从 1916 年开始文学活动起,茅盾就致力于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在他的研究视野里,既有俄、英、德、法和北欧的现实主义作家及作品,也不乏大仲马、司各特这样的浪漫派,此外还有比利时的梅特林克以及瑞典的斯特林堡的“新浪漫派”(即象征主义)。后来茅盾又大量阅读和翻译了前苏联作家的作品。他本人最初“开始写小说的凭借还

① 《鲁迅全集》第 10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55 页。

②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见《鲁迅全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12 页。

③ 郭沫若:《少年时代·我的童年》,见《沫若文集》第 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 114 页。

④ 郭沫若:《学生时代·我的学生时代》,见《沫若文集》第 7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 12 页。

是以前读过的一些外国小说”^①。正是广泛汲取异域营养,并加以创造性的转化,茅盾无可争议地跻身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列。诚如他自己在总结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经验时所说:“要借鉴于西洋,……自当从希腊、罗马开始,横贯十九世纪,直至‘世纪末’……我认为如此方能取精用宏,吸取他人的精萃化为自己的血肉,这样才能创造划时代的新文学。”^②应该说,上述言论已不仅仅是属于茅盾个人的经验之谈,而是以鲁迅、郭沫若、茅盾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的先驱者和创造者们共同的文学取向。

进入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对于外国文学的引入和吸收进一步深化。不仅原先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范畴的近现代文学继续在中国文坛产生影响,而且从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的苏俄文学也在中国现代文坛留下了深刻印记,并一直贯穿于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始终。回首中国现代文学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外国文学的涌入给予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刻影响。中国现代文学正是通过对外国文学的引入、借鉴和吸收,告别旧的古典形态,步入新的现代形态,并最终成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史,就是一部超越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坚定地走向世界文学的历史。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借鉴、吸收外国文学并加以民族性改造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历程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本民族的文学传统,而是必须从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宏观视野出发,循着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相互渗透和融合这一主线。惟此,我们才又可能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

① 茅盾:《谈我的创作》,见《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26页。

②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见《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17页。

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在融会外国文学所取得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一个正确、全面的了解。在这方面,我们曾经历了一个迂回、曲折的过程。

1922年,胡适发表长篇论文《五十年中国之文学》。在文章的最后一个部分,胡适谈到了新近发生的文学革命运动。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以后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陆续出现,截至新中国建国前,有多本专著问世。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28年版),周作人《中国新文学之源流》(北京人文书局1932年版),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版),李何林《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生活书店1940年版)等。^①综观以上著作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论述,一个突出的特征是把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放在其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联中加以考察。比如胡适在论及中国新文学发生时,着重谈了两件事,一件是白话俗语的使用,另一件就是对欧洲新文学的提倡,并重点提及了北欧的易卜生、斯特林堡、安德森,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托尔斯泰,波兰的密茨凯维奇等人的名字。^②周作人也在梳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时指出:“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各方面思想,到民国初年,那些东西已渐渐输入得很多,于是而文学革命的主张便正式地提出来了。”^③李何林更是把中国新文学视作“世界各国近三百年文艺思想的影响”的结果,注重从中外文学相互关联的角度对中国新文学近二十年间发生的各种文学思潮进行理论总结。^④

① 参阅王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3期。

② 参阅胡适:《五十年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257页。

③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之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④ 参阅李何林:《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建国后,按照教育部提出的“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①的方针,国内兴起了一股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热潮。先后出现了一批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其中有代表性的专著计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蔡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话》,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和《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等。与建国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相比,建国后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教材一个显著的不同是,避而不谈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存在的事实关联,而把中国现代文学看作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的发展情况”。这一编写原则在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方面有其可取之处,但它对中外文学事实关联上的忽略也是一个明显的缺憾。

在中国新文学成为国内各大学文科主要科目的同时,港台部分学者同样十分重视对它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有两部。一部是台湾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另一部是香港学者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1975年)。与大陆学人避而不谈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思路截然相反的是,两位著者都开宗明义地把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视作他们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出发点。如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自序》中明言,自己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时,所凭借的就是多年来西洋文学的训练。正是在西洋现代小说的对照下,他“在读五

^① 《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转引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序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

四时期的小说,实在觉得它们写得太浅露了”^①。司马长风也认为,对西洋文学的过分模仿限制了中国新文学的艺术成就。在他看来,新文学的正确态度,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文学要加以批判和提炼,同时对西洋文学要做批判的吸收,来丰富和更新自己的传统,并意在说明“凡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都是能接近传统,在民族里有根的作品。……反之……断弃传统,而先天不足,没有血气和生活力,不管一时获得如何的评价,终在中国文学大流中消逝”^②。

与此同时,国外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也相当活跃。由于“国外重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不一定是认为这一时期产生了伟大的不朽作品和作家。他们重视的是这一时期是非常复杂的世界文化对一个悠久的伟大民族的文化产生影响的最好范例”^③,这就决定了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不像当时的国内学者那样仅仅把中国现代文学看作是中国现代政治生活的一个产物,而是普遍地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分析,得出自己的评价。比如美国柏克利大学的白之教授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农民形象的研究。“他从鲁迅《故乡》里的闰土讲起,讲到茅盾描写北伐时期湖南农民运动中老农形象的《泥泞》,吴组缃《樊家铺》里的农妇,茅盾《水藻行》中两种全然不同的农民,再联系到《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和《李顺大造屋》中的李顺大。他把‘五四’以来的农民形象连成一气,着重研究作者和农民的关系以及主人公和读者的关系。例如从《泥泞》看,作者与农民的关系是同情的关系,农民低一等,是麻木的,作者是高一等,是

① 参阅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自序》,台北传记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1 页。

②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导言》,香港昭明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6 页。

③ 乐黛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国外》,见《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8—79 页。

清醒的。在《小二黑结婚》中,作者则在农民之下,小二黑形象高大,作者歌颂他,向他学习。《故乡》呢,作者和农民是平等的,都不知道将来前面的路是怎样。……作者也没有高高在上,也没有歌颂农民,所以这是平等的。白之教授把这些不同的关系画成曲线,以纵坐标表示不同年代,横坐标表示作者与农民的关系,或上或下,这个曲线与中国革命的发展基本吻合。再把这个中国农民的系列与曲线和欧洲小说、俄国小说中的农民相比,得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①

七十年代末,在党中央拨乱反正政策的英明指导下,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开始重现勃勃生机。人们在反思“左”的思想路线给现代文学研究造成的戕害时,清醒地认识到实事求是地清理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还中国现代文学史以本来面目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1978年7月30日,“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讨论会”在昆明举行。时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的王瑶先生在会上做了题为《现代文学中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的会议发言。在这篇发言中,王瑶先生开宗明义地指出:“‘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还广泛接受了外国进步文学的影响”^②,并就如何正确地认识外国文学给予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1979年,王瑶先生重新修订了建国初期刊行的那本影响甚广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并特地为修订本加写了一个前言。在这个前言里,他再一次引人注目地提到了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

“五四”新文学之所以“从思想到形式”都和过去的作品有了不同的风貌,在创作上吸收了外国进步文学的现实主义的

① 乐黛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国外》,见《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2—83页。

② 《昆明师范学报》1979年第1期。

经验和方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五四”时期许多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实际上都是以外国进步文学作为立论根据的。……外国文学作品对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这是形成“五四”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因素。^①

而上述这些内容在 1950 年的那个版本里是只字未提的。1980 年,王瑶先生在《鲁迅研究》上发表长文《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在这篇被学界誉为“垫高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起点的”^② 文章中,作者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从多方面清理了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为新时期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介入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研究格局起到了示范作用。在比较文学介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促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总体格局做出重大调整的过程中,北京大学的乐黛云教授是功不可没的。1981 年,乐黛云教授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在这篇“得到了广泛的赞扬”^③ 的文章里,作者本着“还历史本来面目和对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作出正确评价”的态度,全面地梳理了德国思想家尼采在二十世纪初被引入中国直至四十年代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清晰地勾勒出尼采在中国不同的时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并指出了所以产生这些影响的原因。透过这些分析,作者意在揭示“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接受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这样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④。

①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6—17 页。

② 吴小美、魏韶华:《比较文学的开放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放——评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比较研究》,见《文学评论》1988 年第 2 期。

③ 季羡林:《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序》,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 页。

④ 乐黛云:《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见《北京大学学报》1981 年第 5 期。

文学给予我们的影响。毋庸讳言,在我们经历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与外部世界的隔绝后,海外学者用比较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方法和手段确曾让我们一度感到“新颖”。但需要指出的是,从比较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并不是由海外学者最先开启的。我们在前面回顾中国现代文学迂回曲折的研究历程时,已经指出,早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立之初,比较方法已广泛地运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了。只是由于建国后“左”的思想路线的干扰,我们才背离了原本正确的方向。新时期以来在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的突破,并非是一种无所依傍的创举,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以往研究传统的继承和拓展。事实上,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密切关联,绝不仅仅是由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开放性单方面决定的,而恰恰是植根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相互影响和渗透这块土壤之中的。这一点不仅构成了我们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规律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我们把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 从中西现代文学比较到中西现代戏剧比较

美国文学理论家厄尔·迈纳(E. Miner)在其近著《比较诗学——跨文化研究札记》里,在解释造成东西方诗学差异的根本原因时,曾把它归之于西方叙事性文学传统和东方抒情性文学传统的分野。^①如果把中国的抒情性文学传统的时间段限定在中国文学由传统转向现代之前,厄尔·迈纳的上述见解似无大碍。因为中国历来是一个诗的或者确切地说是一个抒情诗的国度,相较于抒情诗在中国文学中所占的绝大比例而言,中国文学的叙事性文类

① 参阅厄尔·迈纳:《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王宇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7—10页。